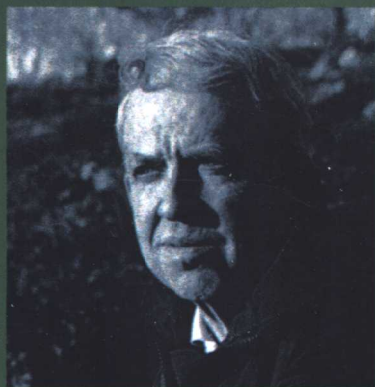


Captured By History

JOHN TOLAND



[美]约翰·托兰著

历史捕影

· 东方书林俱乐部文库 ·

历史捕影

——一个历史学家眼中的混乱世纪

[美]约翰·托兰著 王毅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捕影:一个历史学家眼中的混乱世纪/
(美)托兰(Toland, J.)著;王毅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ISBN 7-208-03386-2

I. 历... II. ①托...②王... III.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1945)-史料-美国 IV. K7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3757 号

责任编辑 杨承纭

湛 嘉

封面装帧 杨德鸿

·东方书林俱乐部文库·

历史捕影

——一个历史学家眼中的混乱世纪

[美] 约翰·托兰 著

王 毅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16.5 插页 2 字数 350,000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7-208-03386-2/K·802

定价 27.00 元

献给我的妻子寿子

译者序

我们刚刚跨入 21 世纪,20 世纪已经成为历史。在本书作者、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托兰上个世纪为了写作而进行研究、搜集材料所去过的那些地方:东京、柏林、罗马、巴黎、纽约、马尼拉、汉城、香港、南太平洋岛屿……还有他也来过两次的北京和上海,人们迎接新千年、新世纪的热情似乎格外高涨。我所处的这个北方海滨城市,也是华灯处处,人流如潮,满街歌舞。然而,当零点的钟声敲响,礼花灿烂升空,人们欢声雷动、拥抱雀跃时,不少人也忍不住想一想:过去的这个世纪究竟是什么?它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的确,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历史是严谨研究的结果,是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真相与来龙去脉;对于普通百姓,它是亲身感受和心灵深处的记忆,是细节,是情感,是叹息、欢笑等等历史书中注定不会出现,但于自己却是刻骨铭心的东西。对于约翰·托兰先生来说,历史则是这两者的天然融合。他这本类似自传,但又大大超出了自传的书,其名称就有着浓郁的个人感受在内。他视 20 世纪为“tumultuous”,考虑到标题的简明,我把此词译为“混乱”,但实际上它更有着“吵闹”、“骚动”、“激动”等等情感体验的意味。选择此词,托兰显然是有感而发,或是冲口而出,或是反复斟酌过的。这不是一个历史学家在图书馆和书斋里所能研究出来的 20 世纪,而是在图书馆和书斋之外,更行程数十万英里,采访数以千计

的人，耳闻目睹、亲身体验、切身感受到的 20 世纪。

约翰·托兰 1912 年生于威斯康辛的拉克罗斯，尽管父系和母系家族都有其独特性，但他却是在一个经济常显窘迫的家庭中长大。他梦想做一个剧作家，但却屡屡受挫。他的学生时代正赶上美国经济的大萧条，寒暑假常常是与当时“在路上”的一群流浪汉一起爬货车旅行、打工、想方设法求食，并因此曾五次被判短期服刑。这样的生活经历不但激励他创作了一些未能成功的剧本和小说，而且还导致他一度加入了美国共产党。然而，对他一生、他后来的成功，真正具有意义的却是他从底层理解了社会和人生，领悟到了真正的历史，其内涵、其意义、其魅力究竟何在。

二次大战他参加了军队，但干的是劳军娱乐这样的事情，与战争并无直接关系，也缺乏直接体验。所以，当一直想成为一名虚构作家的他，在 42 岁以后以一部接一部的写二战、一战和朝鲜战争的历史著作连连成功，名声大振，获得美国非虚构作品的最高奖“普利策奖”时，人们惊讶从什么地方冒出来这么一位历史学家？正如托兰自己所说，他之所以成为一位历史学家，不是因为偶然或是有意设计，他从来没有修过历史课，更没有历史学家的文凭。之所以能够独特——所以也就是成功地——描写 20 世纪那些最混乱的事件，真正起作用的，一是他当年剧作家梦想时刻苦训练的根基——托兰发现自己总是将历史视为戏剧，他的写作有着一一种叙述性的结构和戏剧性事件，而不是枯燥的日期和人名的排列，这使得他的历史著作异彩纷呈。更重要的是，这联系到更为本质的另外一点，那就是对人——尤其是对普通人、底层民众的重视、尊重和那种本能的、能够与他们作心灵沟通的素质与能力。本书中，他谈到外祖父在

这方面对自己的深刻影响，这位老人有着广交朋友的本领，上至市长下到卖冰淇淋的都可以成为朋友。对此，艺术家气质的父亲不以为然，加以嘲笑。但托兰很佩服这种“朴实随意地显示出一种友好”。

托兰非常好奇，这种素质在他青少年时就表现出来。这不仅仅是对一个个生活故事谜底的好奇，更是对构成故事的那些人，对他们的心理、性格、思想的好奇。所谓“好奇”，就意味着去发掘、探索——没有定见、不带成见地去探索。这一点并不容易做到。在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和没有“历史结论”的大事上或许还不难做到，在那些业已形成“历史结论”的重大历史事件上就难以做到了，甚至你这样做，都会形成一种冒犯和亵渎。在本书中可以看到，即使是在美国，托兰也一再被人批评为“缺乏道德感”、“客观主义”，他写珍珠港事件的《丑闻》，涉及到罗斯福总统事先到底知不知道日本特遣舰队的来袭，结果引发了轩然大波，托兰为此感慨再三。

在任何重大历史事件上，那些已经形成的历史结论自有其必然性、深刻性和合理性，有着它们的分量。任何对此的无知或轻蔑本身都有理由被批评为无知，遭到轻蔑。但是，我在此书的翻译中，丝毫没有感觉到一位特意做翻案文章，标新立异、哗众取宠、捞取名利的历史学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托兰为自己的历史研究，为自己的著述规定的那些基本点：“活的历史”、“普通人的历史”、“非意识形态的历史”；对于作家来说，他不是“研究历史”，而是“在历史中生活”。

“活的历史”，这个说法不仅是说历史中活的生命、活的过程、活灵活现的场面，更强调着对此不应主观干预，难以

主观干预之意。

这种不作主观干预，首先表现为对史实的真正的采纳——首先是在广度上，有了广度才谈得上深度。钱钟书先生曾有过一个深刻而又俏皮的说法：对于那些举了一两个、两三个例子后就说“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不胜枚举”的人，你一定要明白，他所知道的已经全部倒出来了，“等等”只是在掩盖他的贫乏。托兰先生不是“等等”先生，不是举了有限的几条材料后就出现“综上所述，足以说明”的历史学家。在成名作《突出部战役》的写作中，“我几乎采访了将近400个这场战斗的幸存者，包括在这场战斗中被俘的75个平民；我在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比利时、卢森堡和德国旅行了10万英里以上；我在美国国会的议员听证室收集材料，在波恩的联邦德国议会大厦收集材料，在达豪的毒气室里收集材料，在西点军校收集材料，在纽约谢恩园的“参与者俱乐部”收集材料，在阿登纳斯的那些巨大城堡和小屋里收集材料，在五角大楼收集材料，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和利大学收集材料，在比利时的一个石材矿收集材料，在西班牙的浴场收集材料，在绕来绕去的齐格菲防线收集材料，在圣维特、巴斯托涅、克利瓦克、雪域等旧日战场收集材料。我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进行研究，在位于麦克约尔要塞的军史部和位于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的空军大学。

虽然搞的是要玄虚一点的文学，但在做学位论文时，导师吴中杰先生还是一再对我们强调不要“以论带史”，而要“论从史出”；黑格尔说研究历史的最佳境界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尽管其实他本人仍免不了以逻辑切割历史。对于托兰来说，似乎不仅仅是“论从史出”的问题，而是“论在史中”了。泡特是一位曾经极认真教过托兰的剧作家，“我只

是在做泡特教我去做的：我凝视着我的人物，让他们做他们不得不做的事情，说他们不得不说的话。唯一不同的地方是：我的人物是真的人，而非我想象出来的产物。我只是一个观察者，观察双方，但并不加入某一方。‘这真是很容易，我仅仅是记录而已。’事实上，一切当然要复杂得多。我必须不断地对我的材料进行分类、安排，决定使用哪些省略哪些。我还要尽量把事实与想象区分开来，在真正发生过的事情与一个叙述者他说——或一份官方报告或政府声明说——发生过的事情之间进行辨别。我尽量避免的就是掺入个人的评判或是解说，那就意味着不是作道德方面的评价就是要找出某种事件之外或事件之后的‘意义’的企图。我还学到了另外有益的一课：永远不要去写那种‘半真相’，所谓‘半真相’自然也就是‘半谎言’。”

托兰的战史写作，被评论为写的不是将军或政治家们的战争，而是士兵和平民们的战争。当历史被当作历史介绍出来时，它总是一部重大事件的编年史，而且这些重大事件的叙述和说明也往往离不开特定意识形态的限制。但对于托兰来说，他更注重的是重大事件中的人和细节，注重的是重大事件中可能会被意识形态因素忽略或遮蔽的多面性（读者可以稍稍注意一下书中第三卷《阿道夫·希特勒》中“莫根法官与希特勒作对”那一节。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为希姆莱工作的德国律师、一个党卫军中的法官，是如何基于人类良知试图制止集中营里的反人类的暴行的）。他这种“非意识形态的历史”的见解，也得到了我们中国历史学家的赞同。

在翻译时，我的确不止一次地联想到、感叹于我们几年前的一场不大不小的文坛风波：一位报告文学作家（托兰在

中国也要被冠以此名的)写了一部关于一支著名的田径队的长篇作品,引起了方方面面的褒贬。我还是喜欢这部作品的,但是,当看到被写进去的主人公抗议作家从来没有把原稿让他看过,“糊弄他”,更谈不上征询他的意见时,就难免有点无话可说了。的确,从事这样的写作,当事人看过之后,提出异议,你的作品就可能出不来,或者得以你自己很不满意的模样出来。但是,这却是这类写作绕不过去的一个坎,是你为自己作品的可信性和说服力而不得不面对的一道栅栏。你可以翻越过去,可以钻过去,但却不能绕过去。其实,处理得好的话,这道栅栏本身也会是新的灵感、新的内容、作品更具厚重分量、更有启发性之所在。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正是托兰的成功之所在。他并没有因此不能写、不敢写或写不出来真相,而是在写当事人知晓他正在写的真相。我们的报告文学作家们不妨看一看托兰在他的《序》中是如何思考以及处理这个问题的。可以说,较之自己前面那十几本各写一段历史的著作,这本《历史捕影》最有价值的,还并不是20世纪那些重大事件究竟是什么(在这一点上是难免会有争议的。我在一两条译注上也表示了一点不敢苟同),更在于托兰展示了自己是如何发现了那些重大事件背后隐藏着的、从未被讲述过的故事,是怎样找到了那些关键性的人物,又怎样说服他们与自己交谈。这种“如何”发现,可能更具有方法论乃至本体论意义上的启示。

“在他的每一本书中,托兰都要采访那个历史事件的实际参与者,有时是采访好几百个,以便从这些最了解这件事的这些人处得到这件事的各个方面。他尽可能地对这些被采访者持一种客观态度。‘我相信这是我的责任,’他说,‘把一切都告诉你,让你自己得出结论。我把自己的意见控

制在最小限度。”毫无疑问，比起以某种意识形态作为指导来采写、评说历史的人来，托兰这样的作家，反而可能具有更真挚、更内在、更为宽广和坚实的道德感和评判立场。

托兰是把这本既是自传，又是一生写作浓缩的书作为自己人生最后一本书来写的，在1996年完成时，他已是84岁。回首往事，他追问自己为什么会对20世纪的动荡、尤其是战争那样有兴趣？“为什么我用自己生命中的几乎35年来写战争”？

他曾用一种精神分析的思路来解剖自己：我是不是因为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些战争，所以就全力来描写？之所以被这个主题吸引是不是因为一种秘密的羞愧感：自己没有上过前线？但最终他相信，之所以写作战争，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根本上憎恨战争。“在我的那些书里，敌人就是战争，而不是我们去打的那些人。”这种对战争的憎恶在小学时，听一个一次大战的士兵讲战争，他不是渲染英雄主义，而是在讲所有那些死者——那些呼唤着妈妈和家人倒在他脚下的人时就已萌生；在读《西线无战事》，看到了战争的恐怖和非人性时，就已萌生。“尽管我压根对政治没兴趣，我却因此而永远爱上了和平。我成为共产党人时，我选择了加入‘美国和平动员大会’，我为和平而在白宫前面当纠察队员。然而，如同我那么多加入了‘美国和平动员大会’的同志一样，在珍珠港事件后，我们报名参军。后来，我反对朝鲜战争，公开谴责越南战争和海湾战争。”这种已经成为本能的道德感和评判立场，就使得托兰在自己的书中“把战争写成了敌人，而不是它的参加者。也许这也是为什么我能够贴近一个德国人或一个日本人，就像贴近一个美国人或我们的一个盟友一样。我表现了战争双方的英雄主

义和胆小行为,我想表现的是战争的疯狂愚昧”。这的确可能导致某种客观主义,导致放过了人在历史大事件中应负的责任。托兰先生有没有这种嫌疑,我不敢说;然而,书中有一段颇有抒情意味的文字:意大利科莫湖地区一个叫做唐戈的地方,托兰和妻子寿子一起去采访墨索里尼之死,他们走在湖边。“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如同一出歌剧的背景,一个小小的公共广场就在湖岸边,后面升起的一座山就像神秘的圆形布景一样。当曙光降临在这个安宁的小镇上时,我脑子里满是墨索里尼走向自己的归宿时看到了什么的想象。我身边这种大自然的美似乎被毁灭和苦难的记忆压倒了,这是这个愚蠢的人带给这片土地的,而这片土地在自己漫长历史中早已经受了太多军队的践踏。”看到这个地方,我是相信托兰先生同样注意到了那些应该对历史负责的人,无非是更具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罢了。

尽管托兰先生始终没有忘掉他的戏剧家梦想,始终有一个“戏剧情结”,但这本《历史捕影》却的确不是一本很富有文学戏剧性的书,里面那些被外国出版商看好的重大事件“揭密”,由于这些年很多“揭密”类书籍的出版,似乎也不是特别新奇有趣;它的戏剧性在于一种生活本身的戏剧性——一个“酷爱文学”的业余作者,如何成为被历史和生活所肯定的作家——历史学家,而在这么一个许多人都梦想过但却从未成为现实的梦想成真之中,所揭之密仍然是人如何去了解人,了解社会与生活,以及如何这样做的基本态度与途径。

王 毅

2000年元月于大连

鸣 谢

没有欧洲、亚洲以及北美的一些人的合作，这本书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尤其是那些生活在日本、生活在希特勒时期的德国，以及许多生活在美国和生活在东欧的人——当写作这本书的研究工作在多年前完成的那个时候，他们还生活在铁幕之后。我也要感谢国家档案馆，弗兰克林·罗斯福图书馆，以及国会图书馆，它们向我提供了档案、信件以及那些与希特勒关系密切、处于他内部小圈子的人们的谈话录音，还有关于日本、中国、朝鲜和东南亚以及菲律宾的材料。这些录音在当事人死去之后即对所有的研究者开放。

我还要向五个人表示感谢，他们对这本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是：我的主要助手和翻译、我的妻子寿子；我的经纪人卡尔·布兰特；我在威廉姆斯学院时的同学弗雷德·斯托金，从我的第一本书时起他就一直帮助我；詹姆斯·韦德，他与我一道工作，编辑、修订了几卷内容；还有圣马丁出版社的罗伯特·韦尔，他说服我大大地改写了第一次草稿。我也感谢伦道夫和伊丽莎白·萨姆，他们让我使用了他们的传真。

序

在 42 岁前,我是一个会被这个世界视为失败者的人。但我并不视自己为失败者。我从每一次错误中都尽可能多地学到了东西。我妻子寿子曾对我说:别人所说的失败,实际上不过是踏脚石而已。我现在已是 84 岁,回顾自己的一生,我看到,冲我而来的每一件事,前半部分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我要去做的它那后半部分的准备。正如莎士比亚会提醒我的那样:“神力决定了我们的归宿,我们所做的其实有限。”

我之所以成为一个历史学家,不是偶然,也不是有意设计,而是因为命运。有时我想,我与我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本无多少联系,而是因为在它们的每一个关键时期,人们都向我打开了大门,打开了发现之门。我并没有被训练成为一个历史学家,我也没有历史学家的文凭,所以我就得让我的工作来为自己说话。在我长大成人后的前 24 年中,我曾真心诚意地想做一个剧作家,我曾干过许多并不特别体面的工作。在 30 多岁时,我爬过货车,完全是一个流浪汉(尽管是一个手提箱上贴着威廉姆斯学院标记的流浪汉)。我发现自己擅长于挣钱,但却从来没成为一个商人,钱对我来说总是一种手段(帮助我完成学业,使我有时间写作剧本,能够抚养家庭),但永远不是目的。

就体格而言,我并非仪表堂堂,而是身材瘦小;我既不

健壮肌肉也不发达，是一个旁观者而非参与者，一个永远也不会卷入街头打斗或战争的人。我也没有威严逼人的气势，也许这正是为什么人们会开始与我交谈的原因，因为我不是在威胁。如果你在自己的言语和行动中表明你并不从他们身上寻求什么东西，并不以他们的付出来得到金钱、优势、权力或影响等等的话，那么，愿意帮助你的人会多得惊人。我总是个倾听者，喜爱倾听那些如此生活一生的人，听他们述说这种生活。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我的命运。我会见访谈了数以千计的人们，他们告诉我他们的故事，因为他们多少感觉到我想倾听，而且是真心诚意地喜欢会见他们。我所会见的这些人中有许多干过骇人听闻的事，但这对我来说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没有被派去审判他们，而只是去倾听他们就自己在 20 世纪这部混乱的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将自己对某人的成见搁置一旁。安德烈·纪德的请求“请不要过快地就懂得了我”，正是我去接近任何人的方式。读者将会看到，我从我的第一位指导教师泡特·爱默逊·布朗处就学到了这一点。——他是一位出色的剧作家，但在心爱的妻子死去后却开始酗酒，我父亲把他带回家来，促使他清醒。他在我家呆了几年，因此也就给予我生活中的一种关键性的影响。在此之前，当我 8 岁时，他就曾把我带到他公寓的工作室，让我看他的一个微型剧院模型。他可以在舞台上移动他的人物，他告诉我说：“我俯瞰戏中的这些人物，我让他们做他们不得不做的事。我从希腊人那里学会了这一手，我是情节这部机器的神灵。但是，人物却是独立于我的，我坐在那里，让他们说他们一吐为快的话。”正是布朗教会了我去消隐自我，在均

衡中 去掉自己的意见与评判。

我运用这个原则来书写历史。我学会了自己必须出去，去会见那些在历史中扮演了或大或小角色的人们，而不仅仅只是在档案中阅读他们。如果不是会见了数以百计的认识阿道夫·希特勒的人，那些从他所有的不同方面、很多时候是相当可怕的方面了解他的人，我是不可能写他的。在我写作关于希特勒的传记时，比起任何其他历史学家来，我可能认识更多的与希特勒相识的人。他们愿意与我交谈，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准备倾听他们。

当然，我也将一个人对一件事的看法与另一人对同一件事的看法进行比较。比方说，我与奥托·斯科尔策尼和阿尔伯特·施佩尔各自交谈了数小时，施佩尔会问我：“斯科尔策尼对此事怎么说？”斯科尔策尼也会问我：“施佩尔对这件事是什么看法？”温和一点地说，他们之间至少是相互不喜欢。他们都知道我在相互验证，他们知道我在与尽可能多的人谈话，甚至包括那些会驳斥他们看法、乃至会攻击他们的人。然而他们并不在乎。在写每一本书时，我都向我的访谈者郑重承诺：我所写到的关于他们的每一件事，尤其是当引用他们的话时，如果不给他们一个机会事先阅读的话，我是不会发表它们的；如果此人提出异议，我将从书中删除这一部分内容。但我并不承诺做任何超过这个限度的事。

如果我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我所得到的虚假的、恶意的述说，我干脆就不用它。当多方验证证明一些叙说是歪曲或至少不是真相时，我也会抛弃这些为自我服务的、不真实的材料。我还不得不向施佩尔表示敬意，他是所有人中最能干的装配大师，具有一种将真实与虚构结合起来的天才能力，他曾数次愚弄了我。但斯科尔策尼却从未对我撒

说谎。这些正是一个历史学家总会遭遇到的陷阱。你必须预料到它们，也要警惕它们。要接受一个事实：如果你要在历史中开拓新天地的话，就难免犯错误。重要的是：当你发现自己已被误导，就要去改正你写下的记录。同样，我也提醒自己：如果我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歪曲了我的访谈者所说的，我也一定要纠正。

另一方面，我也就自己所听到的和看到的来写。那些访谈者可能并不高兴看到自己的谈话作为打字稿出现后的那个模样，但他们至少有一个机会来作修改。我告诉他们，他们可以删除他们曾经告诉了我的任何事情，但是我却从未丢掉一个好故事。很多历史学家并不像我这样做，我也曾被批评为“缺乏批判性”、“容易上当”。如同安布罗斯·比尔斯一样，我也试图依事情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去看，而不按它们应该是什么样子去看。我希望我这本书能向读者表明我既不过于天真，但同时也不有意地去服从任何主题。

这本回忆录聚焦于一些人，这些人从我为自己那 14 本书的写作所访问过的数以千计的人中选取出来，他们一直深藏在我的记忆之中。因为无论他们是好是坏，都是对 20 世纪历史的最有说服力的见证者。为了能在一个可使他们活起来的背景中表现他们，我重新讲述并增补了我笔记本中记录下来的他们的故事。对于那些不熟悉我记载的历史中的事件与人物的读者，我希望我那些简短的述评能够提供一些引发兴趣的东西，能够鼓励他们读下去。

除了我会见过的那些武士、罪犯、英雄和恶棍外，在本书中我还写了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写了我在四个漫长的暑假里爬货车和搭便车漫游辽阔国土时所遇见过的一些人。